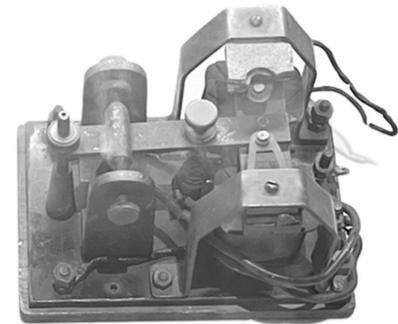




观众参观雕塑《国际友人在延安》。



埃德加·斯诺采访时用过的旅行箱。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美国旧金山广播时使用的继电器。

国博专题展讲述国际友人并肩抗战

铭记血与火浇铸的跨国情谊

埃德加·斯诺的红军八角帽、“飞虎队”飞行员穿过的军服、白求恩的《自画像》……近日，由国家文物局、国家档案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在国博开幕。

展览分为“报道·发声”“军事·战斗”“救护·医疗”“援助·捐赠”4个单元，通过300余件（套）实物和400余张照片，生动展示抗日战争中用鲜血与生命书写的国际情谊和全世界正义力量共同铸就的精神丰碑。在今年丰富的抗战主题展览中，该展览提供了用“他人之眼”看中国的一个视角，很多展品和图片为首次展出。

铁肩妙笔，传递正义之声

展览中第一件文物是埃德加·斯诺的皮质旅行箱，讲述着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1928年，美国记者斯诺带着这只旅行箱来到中国。1936年，他在宋庆龄的帮助下访问陕北，采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中共领导人的西方记者，并于1937年写成杰作《红星照耀中国》（又译作《西行漫记》）。

“当时全民族抗战尚未开始，这位外国记者凭借敏锐洞察力，捕捉到中国大地上一股撼动时代的新生力量，这股力量正是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火种。”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策展人黄黎介绍，斯诺所著的《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第一次通过文字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态度、主张、战略和敌后战场的真实情况。

斯诺在中国穿过的西装，用过的钢笔、眼镜、名片、印章……一系列文物再现了斯诺在华工作和生活的细节，让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亲切可感。展柜里有一组白底黑字的小纸片，上面还有手写的记号。“为了研究中国问题，斯诺开始学习中文，认识了近1500

个汉字。这是他学中文时用过的汉字块。”黄黎说，斯诺对中国充满热爱，为自己取了中文名“施乐”，展出的名片、印章上都以“施乐”为名。

海伦·福斯特·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汉斯·希伯、罗曼·卡尔曼、卡尔·迈当斯、罗伯特·卡帕、沃尔特·博斯哈德……一大批外国记者用笔和镜头记录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和中国人民的浴血抗争，并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重要贡献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气象传递给外界。

“在华北荒芜的崇山峻岭中，在绿色的长江流域，在华南的稻田和雨水充足的山里，一个拿起武器的民族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领路人。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看到八路军在华北前线的英勇表现，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写下了满怀胜利希望的文字。

他不仅以笔为剑，激荡正义之声，还参与了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的筹建工作。1939年夏，贝特兰与德国医生米勒带领车队穿越日军封锁线，将12辆卡车、600箱药品及“移动手术室”送达西北国际和平医院。1941年12月，日军发起对香港的进攻，贝特兰放下采访本拿起步枪，成为香港保卫战中唯一参战的外国记者。香港沦陷后，他被囚于香港和日本的战俘营近4年之久。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达延安采访。记者团包括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夏南汉、普金科6名外国记者，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塔斯社等新闻机构。他们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参观边区政府、新闻单位、医院、兵工厂、难民工厂等机构，发表大量介绍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报道，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我从陕北回来》《北行漫记》等著作。“这份斯坦因的采访提纲值得细看。”顺着黄黎的指引看

过去，只见采访提纲上列出了七大问题，围绕这些问题，斯坦因与毛泽东长谈12个小时。

同仇敌忾，共筑钢铁战线

在展览第二单元，一批由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提供的档案资料引人驻足。这些档案首次在中国公开，详细记录了苏联在抗战初期对中国的重要援助，包括装备清单、运输路线和方案等。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苏联率先为中国提供2.5亿美元贷款，秘密派遣军事顾问、援华志愿航空队和技术人员到中国援助抗战，并开辟了全长2925公里的“Z”运输线，向中国输送飞机、火炮、机枪、步枪等武器装备。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共有2000多人次轮流参与飞行任务，库里申科等236名飞行员在中国战场牺牲。

一组水彩画再现了中苏空中勇士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丽场景：1938年2月18日，中苏空军联手创造12分钟击落敌机12架的战绩，赢得武汉抗战的首次空中大捷；1939年7月25日，中苏空军奇袭运城，炸毁日机30余架……

展厅中央直径6米的圆形展台上，陈列着1:2比例复原的飞虎队P-40战斗机模型，机头喷印的鲨鱼图案威风凛凛。飞虎队全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1年由陈纳德组建。1942年7月，飞虎队编入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1943年3月，改编为第14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飞虎队还飞越无比艰险的“驼峰航线”，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从1942年到1945年，通过“驼峰航线”运到昆明的战略物资达80多万吨，1000多名中美飞行员长眠于雪山冰川。

“这叫‘血幅’，贴在飞虎队员的飞行夹克背后，便于中国军民区分敌我，在飞行员迫降、跳伞后实施救助。”黄黎介绍道。

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14航空队中尉唐纳德·克尔在驾机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时跳伞，被东江纵队营救。克尔与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在深圳坪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81年后，唐纳德·克尔之子大卫·克尔来到展览现场，重温了中美并肩抗战的动人画面。

盟军总部表彰李温平为修建中印公路做出卓越贡献的奖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考察的照片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的纪实影像……这些文物和资料展现了中外军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结下深厚友谊。

心怀大爱，铸就人道丰碑

走进“救护·医疗”单元，一处场景复原让观众仿佛来到了炮声隆隆的抗战前线，感受白求恩等外国医生在“流动手术室”紧张工作、救死扶伤的情景。

1938年初，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加美医疗队带着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材赶赴中国，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唐县逝世。在中国的近两年时间里，白求恩在延安和晋察冀军区各地展开工作，悉心改进八路军部队医疗工作和战地救治，培养和训练医务人员，救治大批

伤员。为适应游击战的需求，白求恩发明了一种可以用牲口驮着出入火线的轻便手术设备——药驮子。药驮子中分成若干小格，装载的物资可进行100次手术和500次包扎。两个药驮子中间搭个门板，就成了临时手术台，展开、收起十分方便。展厅中展示了药驮子模型，其外形像座桥，白求恩的医疗队称其为“卢沟桥”。

一张“结字第伍玖伍号”的结婚证，诉说着一段抗战烽火中的跨国情缘。这是1940年3月，陕甘宁边区民政府发给马海德与周苏菲的结婚证。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出生于美国一个黎巴嫩移民家庭，1933年获日内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赴华行医。1936年，马海德经宋庆龄推荐，与斯诺共赴陕北，成为首位加入红军的外籍医生，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推动医疗事业发展期间，马海德结识了鲁迅艺术学院学员周苏菲，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海德成为新中国首位外籍公民，长期担任卫生部顾问等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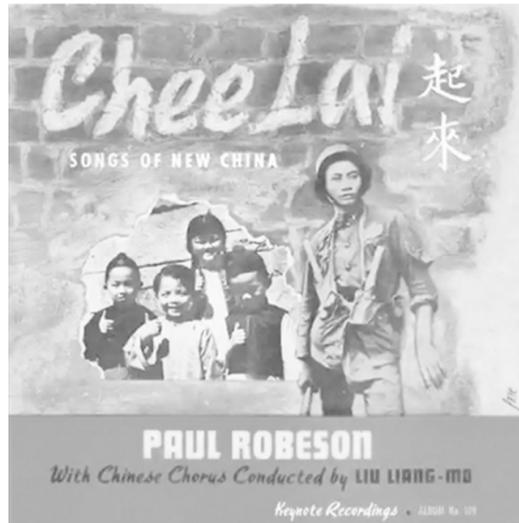
长眠于太行山区的印度青年医生柯棣华，试制出青霉素缓解战地用药匮乏的傅莱，在延安和太行山区为抗战军队卫生医务工作做出可贵贡献的汉斯·米勒，被陕甘宁边区政府评为“模范医生”的安德烈·阿洛夫……除了这些仁心妙手的白衣使者，还有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以各种方式援助中国抗战，彰显了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为首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约25万名中国平民；英国学者林迈可多次冒险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物资，还协助延安向海外发射无线电信号和英文广播；路易·艾黎与斯诺等人发起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组织流亡工人、妇女、难民成立近2000个合作社，生产大量军民用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1941年，美国黑人歌星保罗·罗伯逊灌制唱片《起来》，收录《义勇军进行曲》等6首歌曲，并将唱片版权及发行收益捐赠给保卫中国同盟，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当参观者走近展示这张老唱片的展柜，头顶的互动感应装置会自动播放罗伯逊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饱含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

“希望广大观众走进展厅，重温那段血火交织的抗战岁月，感受这些国际友人的无私精神，让跨越时空的正义之光凝聚成为珍爱和平、开辟未来的强大力量。”黄黎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美国黑人歌星保罗·罗伯逊灌制的唱片《起来》。

培育法治文化

创建法治营口

